

# 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异

安建华

长期以来,就劳动关系的研究来说,存在着偏重业缘关系,漠视劳资关系的偏向;就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来说,存在着偏重阶级关系,漠视阶层关系的偏向;就阶级内部关系的研究来说,存在着偏重水平分化、强调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漠视垂直分化、否认阶层间权利利益差别的偏向。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一项涉及全国的较大规模问卷调查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我国工人阶级整体的阶层分化(即垂直分化)状态进行观测和描述,初步分析了各个阶层的构成、特征及在整体中的地位,分析了各个阶层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对各个阶层的状况和地位进行了比较,初步探讨了各个阶层间的关系。

作者:安建华,男,1961年生,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

改革15年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社会结构的变迁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异逐渐形成了。

本文即是根据全国总工会1992—1993年在全国职工中所做的5万样本量的抽样调查,对我国工人阶级内部分层状况所做的全面分析。

以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经济生活状况、本人的经济收入水平、住房情况等五个方面的因素做为划分工人阶级内部阶层的分层指标,可将工人阶级整体划分为四个阶层,即高级管理者阶层、行政执行阶层、一般管理劳动与技术劳动阶层、普通劳动者阶层。

高级管理者阶层由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的局级(局以上)干部组成,其人数约占全国职工总数(1.479亿,199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0.07%。

行政执行阶层由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的处级干部和企业单位中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其人数约占职工队伍总数的2.02%。

一般管理劳动与技术劳动阶层由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的科级干部、一般干部、各类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企业单位中的中层管理人员及一般管理人员组成,其人数约占职工队伍总数的43.1%。

普通劳动者阶层由各级各类单位的直接生产工人、辅助生产工人、服务人员组成,其人数约占职工队伍总数的54.8%。

工人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自然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社会政治特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流动等方面,观察和分析这些差异,对于分析和研究工人阶级内部关系,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调动好、引导好、保护好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各阶层在自然特征上的差异

为了观察各阶层在自然特征上的差异,选择了年龄值和性别构成两个指标作为观察量。

### (一) 各阶层平均年龄上的差异

为了表述方便,以高级管理者阶层做为“上层”;行政执行阶层做为“中上层”;一般管理劳动和技术劳动阶层做为“中下层”;普通劳动者阶层做为“下层”(下同)。各层的平均年龄依次为:上层 49.23 岁,中上层 47.24 岁,中下层 37.58 岁,下层 33.54 岁。总体均值(即全体被调查者,推及全国职工队伍,下同)为 35.57 岁。

可见,阶层地位的高低与年龄的长幼成正比:处在较高阶层地位的上层、中上层的平均年龄在 40 岁以上,处在较低阶层地位的中下层、下层的平均年龄在 30 岁以上。各阶层平均年龄的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生活中年龄与社会地位之间的某种联系。

### (二) 各阶层的性别构成

假设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男女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男性占居较高的社会地位,女性处在较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各个阶层的性别构成,将有助于说明该阶层的社会地位,有助于说明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上的关系。

在上层中,男性占 77.3%,女性占 22.7%;在中上层中,男性占 83.2%,女性占 16.8%;在中下层中,男性占 58.1%,女性占 41.9%;在下层中,男性占 50.8%,女性占 49.2%。职工队伍总体的性别结构为男性占 54.6%,女性占 45.4%。

由此可见,各阶层中男性所占比例,呈现出阶层地位的高低与男性所占比例的多寡的正相关关系,尽管中上层比上层的比例更为悬殊,但总的趋势是阶层地位越高,男性所占比例越大。相反,阶层地位越低,女性所占比例越大。在上层和中上层中,男性占绝大多数,性别比例悬殊,在中下层和下层中,男性所占比例为相对多数,与职工队伍总体的性别比比较接近。从这种性别比例的结构关系可以看出,上层和中上层处在较高的社会地位上,而中下层和下层则处在较低的社会地位上。

## 二、各阶层的社会经济特征差异

为了分析各阶层在经济生活上的差异,选择了人均月平均收入、家庭人均月平均生活费支出、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对居住环境的评价、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的评价、对经济收入水平的评价、职业满意度等指标做为观察变量。

### (一) 各阶层的经济收入比较

以“上月从本单位获得的全部收入”均值做为观察变量,比较各阶层在经济收入水平上的差异。统计结果显示,上层为 271.77 元,中上层为 286.24 元,中下层为 249.64 元,下层为 220.02 元,总体均值为 234.18 元。另外“上月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均值做为观察量,比较各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统计结果显示,上层为 154.47 元,中上层为 158.63 元,中下层为 154.94 元,下层为 143.03 元,总体均值为 148.51 元。

由此可见,上层和中上层的月平均收入均在 270 元以上,中下层和下层的月平均收入则在 250 元以下,尽管差距是明显存在的,但并不悬殊;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指标实际上是考察包

括赡养人口以后的人均收入水平。统计数据表明,各阶层在这一指标上也存在差距,但显然,由于赡养系数的拉动,使阶层间的差异更小了。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收入是最难于摸清的统计量之一,而对于“当权者”即高级管理者阶层和行政执行阶层来说更是如此,其经济收入情况亮度极差,很不透明,因此,上述两级有关收入的统计数字,也只能看作是各阶层间在“制度内”的收入情况上的差异,难以做为各阶层实际经济生活状况差异的全面概括。

#### (二)家庭人均月平均生活费支出比较

家庭人均月平均生活费支出指标不但可以独立地做为一项重要的经济生活状况指标加以研究,而且拿它与收入情况做比较,还有助于研究各阶层的生活质量。

统计结果表明,上层的家庭月人均生活费支出为 135.72 元,中上层为 150.83 元,中下层为 147.99 元,下层为 129.11 元,总体均值为 137.72 元。

由此可见,在这项指标上,各阶层间存在差距,但差距并不悬殊;第二、三阶层在均值以上,第一、四阶层在均值以下;职工队伍总体的家庭月人均生活费支出为 137.72 元,而家庭月人均生活费收入仅为 148.51 元,两相比较,说明职工队伍总体的生活质量仍然较差,在总体上仍然处在为温饱而奔波的水平上。

#### (三)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比较

统计数据表明,上层为 16.65 平方米,中上层为 13.71 平方米,中下层为 11.76 平方米,下层为 10.53 平方米,总体均值为 11.14 平方米。

可见,人均住房面积的多少与阶层地位的高低成正比,阶层地位越高,住房面积越大,反之亦然,上层的人均住房面积明显高于均值和其它各层,而占职工队伍总体绝大多数的下层职工群众的人均住房面积则远远低于上层和其它各层,低于总体均值。

如果说,对于当今中国职工的生活来说,住房仍然是其最大的一块生活资料,那么,从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这组数字来看,职工队伍内部的阶层差异是明显存在的,如果再将获得住房的方法和代价,把保有住房而必须支付的费用考虑在内,那么这种差异就更为明显了。

#### (四)对居住环境的评价

居住环境是一个构造指标,其内容包括购物及生活服务条件的优劣、社会治安状况的优劣、交通状况的优劣等三项内容,设三级态度量表,经赋值转换和技术处理后,最大值为 5,最小值为 1,分别表示最高和最低评价。各阶层的评价情况如下:上层 3.52,中上层 3.15,中下层 3.02,下层 3.07,总体均值为 3.05。

由此可见,各阶层对于居住环境的评价是存在差距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阶层居住环境优劣上的差异,各阶层对居住环境的评价均不高,总体上处于“一般”的水平上;上层的评价比较明显地高于其他各阶层。

#### (五)各阶层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平均受教育程度按年计算,各阶层依次为:上层 13.69 年,中上层 13.83 年,中下层 13.14 年,下层 10.05 年,总体均值为 11.46 年。

由此可见,在职工队伍总体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时,第一、二、三个阶层比较接近,均在 13 年以上,而第四个阶层即普通劳动者阶层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则远远低于其它阶层,仅达到 10.05 年,比总体均值低 1.5 年。

通常,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价值的一个潜在因素,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

的受教育程度即文化技术素质,往往直接影响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其劳动力参与市场交换时,往往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其劳动力在参与市场交换时,往往处在不利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职工队伍内部的阶层差异也是明显存在的,虽然这种差距还不悬殊,但的确是客观现实。

#### (六) 各阶层对家庭的经济生活状况的评价

各阶层对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的评价是一项主观指标,设五级态度量表,赋值转换为:“入不敷出”=1,“收支相抵”=2,“略有节余”=3,“节余较多”=4,“比较富裕”=5。经计算,各阶层的评价均值分别为:上层 2.81,中上层 2.68,中下层 2.44,下层 2.39,总体均值为 2.42。

由此可见,各阶层对于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的评价均比较低,大体上处于“收支相抵”与“略有节余”之间;各阶层之间在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的评价上存在差异,但差异不大;阶层地位的高低与评价水平呈正比关系。

#### (七) 各阶层对其经济收入水平的评价

各阶层对经济收入的评价是一项主观指标,设五级态度量表,赋值转换为“低收入”=1,“中等偏下”=2,“中等收入”=3,“中等偏上”=4,“高收入”=5。通过计算均值,考察各个阶层对其经济收入水平与当地以工薪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们的收入水平相比较所处地位的认识,计算结果如下,上层为 2.76,中上层为 2.56,中下层为 2.16,下层为 2.03,总体均值为 2.10。

可见,各阶层对其经济收入水平的评价均偏低,大约相当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也就是说,职工队伍总体对于其经济收入水平的认识是,与当地其他以工薪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相比,处在中等偏下的位置上;同时,各阶层的评价有差距,阶层地位的高低与评价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阶层地位越高,评价越高;上层和中上层的评价接近于“中等收入”,而中下层和下层则更接近于“中等偏下”,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

#### (八) 各阶层对职业满意度的评价

职业满意度是一项主观态度指标,用以分析被调查者对其所从事职业的满意程度,与被调查者当前从事职业进行交叉分析,则有助于判别现实生活中的职业声望、职业地位,为阶层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职业满意度设五级态度量表,赋值转换为“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满意”=5。各阶层的评价均值依次为:上层 4.10,中上层 3.55,中下层 3.33,下层 3.10,总体均值为 3.21。

从各阶层的评价均值可见,各阶层的评价均在中等水平以上,即各阶层对其职业的满意程度都处在“一般”以上;各阶层的评价水平与阶层地位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阶层地位越高,评价水平越高,反之亦然。上层的职业满意度远远高于其他阶层。下层的职业满意度最低,且明显低于总体均值。

从上述几组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内部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阶层差异,各阶层在经济生活水平、职业满意度等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尽管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各阶层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上层和中上层,即高等管理者阶层和行政执行阶层社会地位较高;中下层和下层,即一般管理劳动和技术劳动阶层和普通劳动者阶层,则处于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

### 三、各阶层在社会政治特征上的差异

为了分析各阶层在社会政治特征上的差异,观察各阶层政治权利实现程度以及对社会政治资源占有上的差异,选择了党派构成(%)、职代会代表比例(%)、综合政治态度(均值)等指标做为观察变量。

#### (一) 各阶层的党派构成比较

以各阶层中共党员所占比例为例,可以明显看出各阶层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占有程度存在差异,上层中党员占 88.2%,中上层中占 89.4%,中下层中占 38.5%,下层中占 11.9%,总体中,党员占 25.0%。相反,在各阶层中,“未加入任何党派”者所占比例则依次为:上层为 6.5%,中上层为 8.7%,中下层为 38.0%,下层为 61.5%,总体为 50.2%。

从这两组数字的对比中可见,在上层和中上层中,党员占绝大多数,在中下层中,党员占较大比例,而在下层即普通劳动者阶层中,党员仅占 1/10 强,远远低于总体均值。各阶层中党员所占比例的多少与阶层地位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阶层地位越高,党员比例越高,反之亦然。

#### (二) 各阶层中职代会代表所占比例

职代会是基层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群众行使其民主管理权利的重要渠道,分析各阶层职代会代表比例,有助于全面掌握职代会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实际情况,同时,从中可以看出,各个阶层社会地位的高低差异是如何通过职代会反映出来的。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上层中有 5.2% 的人是职代会代表,中上层中为 39.9%,中下层中为 24.9%,下层中为 17.2%,总体为 20.9%。

这组数字说明,上层即高级管理者阶层,由于其工作的“单位”绝大多数是高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的高级机关,而这些单位因其性质所限,大多没有建立职代会,因此,在工人阶级的高级管理者阶层中,职代会代表所占比例极小,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阶层地位的差异,即“单位”权能上的差异,他们绝大多数在拥有较高权能的非基层单位工作,而其它阶层的职工群众则大多在权能较低的基层单位工作。

在其它三个阶层中,即在中上层、中下层和下层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阶层地位越高,其全部成员中的职代会代表比例越高,而在占职工队伍总数绝大多数的下层职工群众中,职代会代表仅占 17.2%,低于各层和总体均值。因此,职代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下层职工群众的意志,就成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广大下层职工群众对职代会作用的评价不高,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 (三) 各阶层的综合社会政治态度比较

各阶层的综合社会政治态度是一项综合主观态度指标,具体内容包括“对改革的态度”、“对工作的态度”、“对政治的态度”、“道德观念”等四个指标,各分指标又由一系列具体的观点组成,如“您是否赞成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说法”、“您是否赞成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推进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您是否赞成扩大对外开放,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技术、管理、文化、科技,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说法”等等。经过技术处理,使之成为一项综合的五级态度量表,最大值为 5,表示最积极,最小值为 1,表示最消极。经计算,各阶层的综合社会政治态度均值依次为:上层 3.50,中上层 3.39,中下层 3.36,下层为 3.26,总体均值为 3.30。

由此可见,在综合社会政治态度上,各阶层间存在差异,但差异不显著;阶层地位的高低与评价成正比;各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综合均值都不高,都在“一般”这一水平上,没有接近最大值的,也没有接近最小值的。因此,如果把这一指标做为判别各个阶层政治倾向、政治立场的依据,那么,很难肯定其中某一个阶层是唯一“靠得住”的阶层,依靠工人阶级,只能是充分发挥各阶层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整体。此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下层即普通劳动者阶层的社会地位较低,但其综合社会政治态度与其它阶层相比,并非差距很大,而是非常接近。

#### (四) 各阶层选举权利实现程度比较

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的、重要的政治权利,考察选举权利的实现情况,有助于全面了解各阶层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占有程度,分析各阶层在社会政治地位上的差异。

从参加选举人大代表的投票率看,各阶层存在明显差异。在上层中,96.3%的人参加了投票,在中上层为84.9%,中下层为74.4%,下层为66.5%,总体为70.3%,这组数字间存在明显的梯级结构,阶层地位的高低与投票率高低正相关,阶层地位越低,参加人大代表投票的比例越低。

从对候选人的了解程度看,阶层差异也是明显的。各阶层对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了解程度设五级态度量表,赋值转换后,最大值为5,最小值为1,各阶层的评价均值依次为,上层3.83,中上层3.04,中下层2.61,下层2.65,总体均值2.64。说明各阶层间对于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了解程度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从职工队伍总体来说,对于候选人的了解程度均很低,但上层和中上层处在有所了解但“了解不多”的水平上,而中下层和下层则基本上处在“不了解”的水平上。

从上述几组数据中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异,不仅反映在社会经济生活上,而且也反映在各阶层的社会政治生活上,即反映基层民主生活、综合社会政治态度、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程度、对社会政治资源的占有程度方面。工人阶级内部的高级管理者阶层、行政执行阶层,尽管其人数很少,但却占居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广大专业技术和一般管理劳动者、普通劳动者,相对来说处在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其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占有程度相对来说较低,其基本政治权利的实现,存在较大的障碍。

### 四、各阶层在政治观念行为方式上的差异

分析和考察一组人的价值观念和行方式,需要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每一指标体系包含若干个观察变量,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介绍,仅分别就价值观念和行方式的差异,有选择地介绍几个观察变量。

#### (一) 各阶层对政治的关心和参与程度比较

对于政治问题的关心程度和对于政治活动的参与程度,是考察一组人政治价值观念时必须加以了解的。“您对政治的关心和参与程度”是一项主观态度指标,设六级态度量表,赋值转换为:“反感”=1,“随大流”=2,“搞政治很危险,躲得越远越好”和“政治是领导的事,与我无关”=3,“与其参加政治活动不如干点实事”=4,“积极参加一切政治活动”=5。最大值为5,表示对于政治问题的关心和对于政治活动的参与最积极,最小值1,表示对于政治问题的关心和对于政治活动的参与最消极。经计算,各阶层的评价均值依次为:上层4.56,中上层4.60,中下层3.96,下层3.73,总体均值为3.85。

可见,各阶层的政治价值观念存在明显差异,上层和中上层与下层和中下层之间,几乎相差一个态度量级。中下层和下层职工群众对于政治的态度,倾向于“与其参加政治活动,不如干点实事”,换句话说,对于广大普通职工群众来说,他们认为他们身边的“政治”是虚的,与其参加关心这些政治活动、政治问题,不如干点实事。而上层和中上层则倾向于“积极参加一切政治活动”,热衷于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

### (二) 各阶层对劳动目的的认识

分析各阶层对于劳动目的的认识,是为了考察各阶层对于“劳动”价值的认识水平差异。“您从事劳动的主要目的”是一项主观态度指标。赋值转换为:“干活挣钱”或“不上班太空虚”=1,“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2,“成名成家”或“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3,“劳动是公民所尽的义务”=4,“为国家繁荣富强”=5。最大值5,表示对于劳动价值的认识最积极,最小值1,表示对于劳动价值的认识最消极。经计算,各阶层的评价均值依次为:上层为4.12,中上层为4.04,中下层为3.07,下层为2.46,总体均值为2.75。

可见,在对于劳动价值的认识上,各阶层间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以上层和中上层为一组,中下层为一组,下层为一组,它们之间分别相差近一个态度量级,阶层地位与评价水平基本上是正相关关系。

### (三) 各阶层在公共道德问题上的行为倾向

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思想观念,并进而间接地反映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当出现某种危及社会和公众利益天灾人祸时,您怎么办”是一项主观态度指标,设五组态度量表,赋值转换为:“不关心”=1,“随大流”=2,“这样的事情应该由政府来管”=3,“尽力而为,量力而行”=4,“积极参与救助”=5。最大值5,表示行为倾向最积极,最小值为1,表示行为倾向最消极。经计算,各阶层的行为倾向均值依次为,上层4.55,中上层4.52,中下层4.28,下层4.16。总体均值为4.22。

由此可见,一方面,各个阶层的行为倾向都比较积极,当遭遇这种情况时,各阶层在行为上都倾向于“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但同时,各层之间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别的。

## 五、各阶层在社会流动方面的差异

对于研究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内部关系问题来说,社会流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流动问题包含流动意向、流动频率、流动障碍等许多丰富内容,每个方面的内容都需要用变量来加以分析和描述,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仅选择少数变量,通过几组数据,说明工人阶级内部各阶层在社会流动问题上的差异。

### (一) 人均流动频率差异

各阶层中就业后实施过职业流动行为的人,其人均流动频率依次为,上层3.16,中上层2.42次,中下层1.81次,下层1.49次。从中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差异,阶层地位越高,人均流动频率越高,两者成正相关关系。

### (二) 各阶层的择业动因比较

“如果您有机会重新选择职业,您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什么”,这是一项主观态度量表,通过计算,可以看出,上层和中上层以“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做为主要动因,而中下层和下层则以“有较高的收入”为主要动因。在择业动因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层差异。

### （三）各阶层的流动障碍比较

阻碍人们实施职业流动的因素多种多样，在现实生活中，主要包括“调动手续太繁琐”、“人际关系情况”、“收入水平”、“住房因素”、“还未选择到合适的单位”、“想去的单位去不成”等原因。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职业流动障碍上，各阶层间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上层和中下层认为阻碍自己实施流动行为的主要障碍是“还没有选择到合适的单位”，中上层和下层认为主要障碍是“想去的单位去不成”。

以上几组统计结果表明，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异在社会流动问题上也有所反映。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各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拥有的“机会”是不均等的，处在较高社会地位上的上层和中上层拥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实施职业流动行为改善自己的地位；而处于较低社会地位上的中下层和下层则相对来说机会较少，难以通过实施职业流动行为改善自己的境遇，对于广大下层即普通劳动者阶层职工群众来说，更是如此。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 15 年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反映到工人阶级队伍的内部结构上，一个突出特点是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阶层差异。各阶层在对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方式上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流动上有所反映。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彻底建立，中国社会尚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受这一特点的影响，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关系仍是一种过渡形态，具有不稳定性；阶层地位的差异也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之中。研究和分析这些差异，对于协调工人阶级内部关系，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充分发挥各阶层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谭 深

## 《中国社会保障辞典》等书出版发行

△近百万字的《中国社会保障辞典》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1994 年 4 月出版发行。该书由**国家人事部、民政部**和**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资料丰富、覆盖面广。为社会保障工作者和教学、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定价 49 元。

△**潘允康、柳明**主编、**吴颖、郑晨**副主编《当代中国家庭大变动》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 1994 年 5 月出版。全书 23.7 万字，定价 8.80 元。

△**深圳特区社会学会、深圳市民政学会**合编《特区社会观察》，已由海天出版社于 1993 年 12 月出版。全书 41 万字，定价 18.80 元。

△**王中宪**著《社会学理论建设的几个迫切问题》，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 1992 年出版。全书 18.5 万字，定价 2.80 元。

（张）